



李征
回忆录

东纵回忆录



作者于 1951 年



作者于 1991 年

1983 年，
原东纵一支队
政委陈达明与
作者



1986 年作者深入黄田向群众采访



作者和战友们在一起



1980 年



1983 年



1982 年参加《东江纵队史》座谈



黄布与作者



妻子维琦与作者

目 录

从南洋递解回祖国	(1)
香港去来	(17)
东纵早期报纸——《新百姓》报	(35)
战斗的喉舌	(46)
宝安抗日游击队反“扫荡”胜利战	(51)
韬公在宝安	(55)
一次特殊任务	(71)
黄田战斗及其前后	(77)
黄田访问记	(90)
在交通线上	(93)
北栅战斗	(104)
卖柴侦察 夜袭篁村	(109)
宝安大队政工纪事	(115)
东纵宝安政治处政工纪事	(126)
东纵早期的干部训练班“华南队”	(137)
我忆“东流”	(148)
宝安旧事访谈录	(153)
一元化领导的中共路西县委何时成立	(157)

横扫莞太线	(160)
接受深圳日伪投降的经过	(174)
关于史实的几封信	(181)

东进捻平半岛	(187)
平海休整与平海会议	(197)
保卫捻平	(203)
进军惠紫	(211)
四团在紫金	(219)
白云嶂战斗	(228)
东上葵头嶂	(237)
挺进八乡山	(244)
从葵山到七星岭	(259)
深山手记	(267)
北撤山东散记	(299)

附录：

张英：策动麦定唐部队起义	(324)
--------------------	-------

从南洋递解回祖国

45年前的夏天，即1940年6月，在英帝国主义马来亚殖民当局镇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黑浪冲击下，马六甲的殖民统治者也开动了镇压机器，出动“大狗”（密探局政治部主任，英国人）和“小狗”（华探）于26日在华侨书局逮捕了马华作家、戏剧家孙流冰（孙冰、现名孙孺）同志。翌日晨数路出动，抓了黄时森和我^①；陈丽水同志逃走了。我们都是英帝殖民当局以“二王花”（总督令）逮捕而终身被驱逐出英境（包括英属殖民地）的“政治犯”。

我们在马六甲监狱关押了两个月，即于8月底同其他一批犯人，右手被扣上手铐和锁链，一长串地被英印警察（“摩罗差”）押上囚车送到港口码头，乘木船转押上泊在港口的火轮船。我的柱伯母和诸弟到码头送行，我叔母（原为庶母，我生母死后，改称叔母）伤心落泪，登船亲自送我到新加坡，买了四菜一汤陪我

^① 孙流冰同志当时是马六甲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马六甲华侨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主任，马六甲华侨筹赈会宣传股长。

我是马六甲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前任负责人，马来亚学抗执委会委员，马共马六甲各民族各业工人联合总工会党团书记。

黄时森，马共党员、马六甲学抗负责人。

吃晚餐。

轮船夜航马六甲海峡，无甚风浪，翌日上午抵达新加坡港。殖民当局又用囚车将我们一行押送四排坡监狱。监狱铁门紧闭后，才让我们下车，解除了手铐锁链，监狱的职员给“犯人”登记、办手续，存放东西，换囚服。当狱警要押我进监狱时，我叔母又哭了一场，再三叮咛我保重身体健康，忍痛告别。

离开狱门办公室，狱警引我们走过一段场地，来到一幢幢专门关押“政治犯”的三层楼的大监狱（刑事犯另关一处）。在大监狱的办公室定了牢房号和棚号后，又送进一个大场院。场院中有两排油红漆的铁栅铁瓦建的棚棚，俨如动物园关老虎的铁笼，约有十个棚棚，每棚棚关着四十多个“囚犯”。我们马六甲来的几个人被关进×号棚棚。同棚棚的有两个“马共”中央委员：肖明（杨少民）和阿利（张利）；我认识肖明。还有个文化人徐征；《南洋商报》记者陈锦波（陈文川）关在另一棚棚，流冰认识他们。这里真是过“集体生活”了，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棚棚，有说有笑，有玩有书看，日子过得较快。晚饭、冲凉后，则各人被关进单人牢房。翌晨开牢房后，又被关在铁棚棚里过“集体生活”。

过了些日子，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监狱里来了，临时支部负责人同我个别联系。日子久些，彼此逐渐熟悉，能够交流案情。原来这里是出境拘留所，关在这里的400多名“政治犯”都是已经判决定案，由星洲和马来亚各州押送来这里集中，等候轮船，分期分批驱逐出境，递解回唐山。肖明同志说：由于英帝实行高压政策，大逮捕、大镇压，新、马各地监狱都塞满了抗日爱国的侨胞和罢工工人。张伯伦的绥靖主义还在兴风作浪，英帝国主义正在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妄图牺牲中国抗战，对日妥协，怂恿日军向北进攻苏联，以换取日军放弃南进政策。所以今年以来，英帝殖民统治当局大规模地镇压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英帝又在东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有个狱长（英国人）到拘留所铁栅棚的走廊上，宣布了9月底出境的名单，共30多名。流冰和我榜上有名。我即给家里写信，告知月底登轮出境的事，要钱（准备旅费）、要行李。按规定各人在狱中又照一次一时半的半身像。我和老孙早已商定去延安，他也写信给夫人陈明甫（陈明）作准备。肖明第二次同我个别谈话，我说了去延安或去皖南的打算。他表示支持，并告知彭海涵（光涵）和小刘一个月前才走，去了延安。接着肖明同我上了一次党课，讲了“马共”简史，教育我回国后要继续发扬母党（“马共”）坚决斗争的革命传统，在“中共”领导下坚持抗战、坚持革命。这一课给我教育很深刻。我回国后每遇到巨大困难时，一想起肖明的教导我就鼓起了坚持革命斗争的干劲。肖明还告诉我：曾秀隆（寿隆）是香港的老海员，来星洲活动被捕的，也是这批回国，有什么事可同他商量。我暗下决心，此行决不辜负党和肖明同志的期望。

在登轮前一天上午，狱警通知并引我出去会见亲人。亲人探监处是一排长廊似的房屋，光线很暗，黑沉沉的。长廊屋中间从上到下装着一层铁丝网，间隔一米多宽又装着一层铁丝网。探监的人多时，谈话声、哭泣声嗡嗡作响。这是巧妙的设计，使会见者无法接触，无法传递东西。我叔母接到我的信，从马六甲赶来送行。她忧郁地站在铁丝网那边，哑着嗓子交代我：送来一个大皮箱，一个大被包，存放在监狱入口处的办公室里。叔母放低声音说：“有一张100元的叻币放在皮箱内盖的袋子里，不敢多放，要钱用回唐山后再来信。三叔嘱咐你两件事：回乡后娶妻，把‘司马第’后楼修好。”立民伯父写了封信给我，但传递不过来，叔母隔着两层铁丝网，展信给我看，看不清楚。叔母解释说：“柱伯的信写了香港一家同乡店铺的地址，叫你到香港后，有困难可以去拜访他们。”叔母一再叮嘱：“回到家乡一定要来信！”只谈了十来分钟，狱警就走进铁网过道中催人走了。我告诉叔

母：“明天下午3点钟上船……。”

登轮的这天上午，拘留所临时党支部的干事老黄，通知我到×号棚棚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地“政治犯”的联系人：新加坡的欧仲生、伍权；吉隆坡的陈耀光、严瑞仁；怡保的黄密；檳城的陈桑波；马六甲的由我联系。老黄讲了两条：一是“政治犯”自己要团结友爱，有困难互相帮助，回国后要坚持革命、坚持抗日救国，动员难友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二是要认真做好团结“刑事犯”的工作。前两批出境同志没注意这个问题，双方发生了冲突，打起来了。原因是“刑事犯”上船后爱赌钱，赌输了就抢“政治犯”的钱和行李。要接受他们的教训，一上船就要做好“刑事犯”的工作。我们感到党支部的意见很重要，给我们这次不平常的航程指明了方向。会后，我向肖明告别时，他也谈了这两条，我都牢记在心。黄时森同志没同我们一批走，临别时彼此都很难过，我告诉他：“我们要到延安去。”可是这一去竟成了永别，至今杳无音讯，不知时森的下落。

下午1时许，我们30多名递解出境的“政治犯”集合，被狱长和狱警带到狱门厅廊，各人领回自己的行李，脱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然后被引到院场上列队，分几队，每人右手上手铐锁链，由英印警察（“摩罗差”）荷枪押上几辆囚车。另有30多名被逐出境的“刑事犯”也到此集中上囚车。2时许，监狱铁门打开了，囚车一辆接一辆往外开。到达新加坡红灯码头后，我们又被“摩罗差”押下车，各人提着自己的行李，排成一行，准备上船。

码头上人头拥挤，挤满了来送行的亲友。一艘中等的火轮船停泊在码头旁边。舷桥一头系在船舷上，一头斜靠在码头上。舷桥两旁至码头上拉着两条缆索，隔开送行的人，形成一条旅客和“犯人”登轮的走道。3时开始登轮，队列缓慢地向前移动，亲友们都挤在走道旁来话别。我叔母来了，她旁边站着阿丘（丘俊

哲同志，是我同学又是我入党介绍人之一)。叔母一见我铁索啣铛，便潸然泪下。码头上人声嘈杂，一片喧腾。我叔母哽咽着一再叮嘱我：“要保重身体健康！到家乡后一定要来信，好使我们放心……。”

我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到阿丘，我的两手提着两件行李，不能同他热握。他对着我的耳朵悄声嘱咐：“上船后找曾秀隆，他是国内来的，你的组织关系交给他了。”阿丘的送行既是党的委托，又怀有个人深厚的情谊；几句临别赠言，胜过千言万语，更加拨亮了我心中的航灯，使我永生难忘。我对阿丘和叔母告别道：“我会珍重自己，你们放心吧！”

在闹轰轰中离开了送行的亲友，踏上舷桥登轮时，我们“递解出境犯”唱起了田汉和聂耳作的《告别南洋》：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

这首著名的歌曲，此时此刻充分表达了我们海外赤子的心情，唱出了我们对第二故乡的离情别绪，缱绻依恋；也唱出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向往和献身的情怀。

登轮后，“摩罗差”把我们70多名出境犯，押进了大舱底的尾舱，关上尾舱的铁栅门后，给我们卸下手铐锁链。他们日夜有人轮值看守。大舱里灯光昏黄，没有窗户，只靠几个小气筒换气，空气浑浊、闷热。舱前的锅炉房、机房和后舵的车叶，日夜不停地轰响，震耳欲聋。

进舱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分配铺位。我们称“刑事犯”为难友，把好的位置分给他们住，他们很满意。首次接触彼此都有了

亲切感。为了便于商量工作，我和欧仲生两个党员，把铺位摆在曾秀隆同志铺位两侧。其余的“政治犯”按原地域来的安排铺位，以便于联系和工作。陈明，陈英和某某三位女眷，被安置在铁栅隔开的一角；孙冰、陈锦波和伍权的铺位在她们栅外。每人打开铺盖铺在舱板上，忙乱了一阵，安置好铺位，都有了歇息的地方。有躺下伸腰腿的，有坐着倾谈的。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下象棋，有的难友玩麻将牌，有的玩纸牌或“扑克”，也算“自由活动”，各有千秋。

我和欧仲生乘着喝茶的时候，同曾秀隆碰头商量工作。老曾叫我和欧出面，召集各地的联系人开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按照拘留所临时支部的两条意见开展工作。我们即个别通知联系人。参加会议的有：陈耀光、严瑞仁、黄密、叶波涛、欧仲生和我6人。老曾不出面，暗中领导。会上做了3点决定：1、推举我和欧仲生为正副组长；2、动员参军工作，雪兰莪来的人数多，由陈耀光和严瑞仁负责动员，新加坡的人数也不少，由欧仲生负责，其他由我负责；3、决定由伍权、欧仲生、陈耀光等“广府”同志，做“广府”刑事难友的团结工作；为了减少他们赌博的时间，决定筹备文娱节目，举行一、二次联欢晚会。这小组会一开，有了组织，有了活动中心，我们这条“船”也在新的旅程中启航了，骨干分子都活动起来了。

登轮的头两天，我主要找骨干分子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案情和参加革命斗争的概况，征求他们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意愿。从中了解到欧仲生、黄密、陈耀光和严瑞仁都是“马共”党员，是当地“华侨抗敌后援会工抗”或“店抗”的负责人，坚决要去延安，如去不了延安就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波涛是怡保“店抗”的骨干分子，提出过入党要求，未正式参加。孙冰早就打定主意去延安或新四军，陈明跟孙一起走。陈锦波和陈英（女，话剧演员，演过《日出》中的陈白露）自己有关系，打算

去桂林。另外，我还同陈桑波（槟城“钟灵”中学的）和熊开政（吉隆坡“尊孔”中学的）两个“学抗”的骨干分子谈过，他们也表示想去延安。我向老曾汇报了谈话情况；以后几天老曾同几个党员个别谈话。欧仲生同伍权等新加坡的工人谈过；陈耀光和严瑞仁同吉隆坡的工人韦任（大牛）、李洪（小牛）和廖荣、祝贯中等谈过。初步征求意见的结果，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政治犯”想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照顾家庭，要回乡。

伍权是新加坡某机器厂的壮年工人，该厂“工抗”的骨干分子，罢工中被捕的，他是增城人，“广府话”讲得好，又有社会经验，他做刑事难友的工作很有成绩，很快交上了几个朋友。陈耀光是吉隆坡半山巴某机器厂的钳工，中山县人，“广府话”也好，也积极做“刑事犯”的工作。祝贯中初中毕业后在雪兰莪炭山做工，会唱歌、演说，是抗日救亡宣传队的骨干分子，能讲客家话和“广府话”。叶波涛也是“广府人”，很爱唱歌，男高音唱得不错。祝、叶和伍权配合，筹备联欢晚会。头一次联欢晚会，主要是唱抗日救亡歌曲、唱粤曲，拉胡琴、吹口琴等。第二次联欢晚会，几个刑事难友演了出活报剧，剧名忘了，主要内容是根据刑事难友走私和酿酒（殖民当局酒专卖，禁私酿）而被捕坐牢的案情编的。孙冰编了提要，由伍权导演。剧中对他们贫困和受压迫寄以同情，启发他们仇恨英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演出效果不错。伍权和陈耀光等同志也摸到了做刑事难友工作的经验。他们是一帮一伙的，主要是抓住几个刑事难友的头头，讲些爱国爱家乡，江湖义气，团结同心，一致反英、抗日。船行五昼夜，风平浪静。我们囚犯尾舱里也还平静，“政治犯”与“刑事犯”都是“递解出境”，患难与共，还能和睦相处。

船上也“放风”，每天下午一次。“摩罗差”来打开尾舱右舷通向甲板的铁门，锁着铁栅，让犯人轮流站在铁梯上放风。此

时，能看到海景。有一天，陈明同志到普通客舱买东西，发现两个熟人：胡一声（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和陈启昌（该校教务主任）。陈明把老孙的舱位告诉他们。次日，老孙和我放风时，他俩走过来看我们。他俩是“自由出境”的。他俩办学坚决实行抗战教育，深得学生和爱国侨胞拥护。英帝对他们客气一点，采取“限于×天内自由出境”的办法，把他俩赶走，以图把加影侨中师生们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压下去。

又一次到栅栏“放风”，天气晴朗，我们看见“海波绿，海云长”的美丽景色。几群海鸥在海空飞翔，时高时低，时远时近，发出欢快的鸣叫，有的竟围着船迴旋数圈。我们观看良久，十分欣羡，喟然而叹：“啊，我们能像海鸥这样自由多好啊！”“我们何时才能获得自由？”“中华民族何时才能获得自由解放？！”……还有一次“放风”，又看见一种奇景。空中没有海鸥，也没有海燕，海上风平浪静，轮船犁开了海面，卷起层层人字形的波浪。倏忽从海里飞射出无数的飞鱼，一簇簇，一阵阵，如连弩齐发，飞射了一程又一程，直至消失在远处的海中。又一天下午，据说船已到“七洲洋”，海水湛蓝，天空暗蓝。少顷，太阳被浓云遮住了，西天蓝一块，黑一块，紫一块，红一块，呈现出严峻的颜色。听老客说过，“七洲洋”海深，夏天常起风暴，沉过不少船。特别是我们的先辈。乘木帆船过南洋时，在这里遇难的，葬身鱼腹的年年都有，不计其数。这是侨胞的苦难！离乡背井，想摆脱家乡的苦难，飘洋过海，在旅途、在海外又陷入新的苦难啊……！

第6天，已是10月初了。清晨，船抵香港，减速徐徐驶入海湾。不久抛锚了，香港和九龙半岛可望不可即。8时，旅客们离船了，我们70多名“递解出境犯”仍关在尾舱，据说是在与香港当局办理交接中。9时许，一名港英官员带了几名随员乘小汽艇来了。等到10时许，“摩罗差”班头来开了尾舱的铁栅门，

几名“摩罗差”进来，把我们上了手铐锁链，分成几串，押上甲板。我们左手被锁着，还要两手提行李，行动很不便。轮船下面泊着一艘汽艇。我们由舷梯一级一级下来，转到汽艇上，仍是新加坡来的“摩罗差”押送。

汽艇开到香港中环码头泊岸。我们被英印警察押上码头，脚踏着香港的土地，可是我们还没有恢复自由。所谓“终身驱逐出英境”是“包括香港九龙在内的”。明明是中华领土，鸦片战争后，被英帝霸占，还不许我们自由。想念及此，心中十分愤懑。“政治犯”难友们的想法同我一样。离开中环码头，横过大马路后，有人倡议：“我们唱个歌吧！”我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香港同胞、街上行人在骑楼下驻足而立，观看我们这一群奇异的罪犯。我们沿着一条上坡的马路，被押到半山，关进“中央差馆”。其实这里不是牢房，是临时拘留所。不是钢筋水泥的西式楼房，是砖瓦结构的中式平房，中间一个大厅，左右各一个统仓式的小厅，厅前有一长条露天院子，院外有墙有屋，没有安铁丝网，当街的铁门一关就与世隔绝了。拘留所的墙上横横竖竖地写着许多“留言”和诗句，是先前“出境犯”的作品。我也照样在统仓的墙角上，用铅笔给黄时森同志留言：“我们到延安去，延安见！”

香港是金钱世界，钱能通神。这里管理较松，只要花点饮茶钱，可以寄信，可以买食物，家属可以经常探望。住下的当天，曾秀隆和其他人都给家属或亲友写了信。第二天，陈明持曾秀隆的信到徐闲乐社联系。第三天上午，陈明、陈英和曾大嫂来探监。这样，老曾同香港党组织联系上了。我从皮箱里取出100元叻币，托陈明换成港币，买一件大褸、一支钢笔、一块手表。

在“中央差馆”拘留期间，我们小组开过两次会。一次决定加紧动员参军工作，各人按照既定的分工再个别谈话。逐个落实。第二次是在“国庆节”前，我们小组讨论决定再开一次联欢